

馬英九邁向以中國中心之戰略思維的 困境與挑戰

顏建發

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兼國合處處長

摘要

兩岸關係一直是架構著台灣國家發展的關鍵性因素。2000-2008 兩岸處於政治緊繃而經濟鬆弛的狀態。然 2008 年 3 月馬英九贏得政權後積極開展兩岸關係，這一轉變導致標榜以台灣主權獨立的綠營顯得益加邊陲與勢孤，而兩岸以北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乃日趨完備。兩岸表面的衝突態勢趨緩，但實質上卻是更進一步地被編入中國體系與運行軌道，而另一波的結構性摩擦與衝突恐難避免在醞釀之中而躍躍然動。本文試圖從馬英九政府的戰略轉變與其在主權議題、外交作為、國防政策、以及擴大兩岸經貿交流等對中開放的政策改變，所產生的新態勢與可能的後果，指出其戰略與政策上的盲點與疏失，以及未來在兩岸統一與反統一的鬥爭過程中，所可能面對的困境與風險，以及台灣可能的突破之道。

關鍵詞：馬英九、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發展、活路外交、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壹、前言

不管就正面或負面的觀點來評斷，無疑地，台灣的國家發展與中國因素一直脫離不了密切的關係；兩岸關係一直是架構著台灣發展的關鍵性因素。2000-2008 是一甲子以來兩岸關係張力最大的時期。當時兩岸政府所立足的政治原則全然不同，中國方面堅持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台灣方面則堅持「一邊一國」。兩岸在政治立場上沒有交集，有交集的是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交流。2008年3月，馬英九在總統大選上獲勝，而由於其對於以一個中國為基礎的「九二共識」的恪守，北京方面乃相對釋放善意，在兩岸交流政策以及台灣的對外政策方面，給予馬政府較多餘裕而得以開展積極的兩岸政策。這一轉變在理論上的意義是：在大氣候上，美中台三角關係顯然更向美中這一股傾斜，在小氣候上，紅藍綠三角關係則向紅藍這一股傾斜。而整體看來，雖然美中台的界線依舊在，紅藍綠的基本氛圍也還維持著，但在氣勢、內容以及結構的外型上，很明顯地，標榜以台灣主權獨立的綠營顯得益加邊陲與勢孤。

在過去一年半的歲月之中，相較於陳水扁執政的八年，馬英九確實大幅改善了兩岸關係。但我們要問的是，這種的改善支付了多少成本與代價？不能否認的是，那潛存於台灣內部與底層的不安與對立不僅未卻除，反而加深。馬英九自上台以來，所強調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軍事守勢、外交休兵、擴大交流、加大兩岸經貿自由化等等作為，確實讓綠營或弱勢經濟族群的憂慮加深。尤其是，在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風暴之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台灣依賴中國經濟的態勢再度加深，中國掌握市場優勢，台灣內部意見紛歧與對立，而導致第三、四次在台灣舉行的江陳會顯得中國來使高高在上、氣定神閒，而相對地，台灣內部藍綠則互相指責而衝突加深。

相對於台灣整體實力與其在美中台三角架構中的日益邊陲化，中國的氣勢可以說蒸蒸日上，如日中天。所謂的「和平發展的道路與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總結了胡錦濤的新的整體戰略觀，其內涵在於：以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在外交上則努力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很明顯地，近年來，即便包括陳水扁執政的日子裡，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全球化佈局以及透過美中互動架構來處理兩岸關係的作為，已顯露了中國正以鴨子划水的姿態向外擴張，而台灣益加被吸納於中國和平擴張的漩渦之中。中國的對外擴張以及統一台灣的行動，同步進行。統一台灣成為其最終稱霸世界的一個環節；統一台灣也將有助於其稱霸世界的最終目標。在這種思考下，中國在很多問題上，很有謀略地選擇了暫時而策略性地與美國站在同一邊的作為。而不管陳水扁的抗擯或馬英九的扈從都被籠罩在其以和平發展為外衣的擴張性的結構之中。

回顧過往的十年，中國企圖拉近與美國的關係而阻絕台灣通往美國之路的企圖，看來是成功了。利用美國陷入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泥淖中，中國以經濟和外交的交互為用，成功地擴大了其影響力的版圖，尤其確立了其在亞太地區的霸主地位，台灣在區內的生存空間遭到嚴重地擠壓。中國與東協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並施壓亞太周邊國家不得與台灣簽署，在此同時，中國更在台灣通往擴大參與國際活動的路程上，也極力打壓與封鎖，導致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更加地萎縮與險峻。再其次，在經濟上，自 2002 年起，中國推動與香港和澳門間類似自由貿易區，所謂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2004 年 6 月初 9 個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區(9+2)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透過類似自由貿易區的措施，中國企圖強化其國內、港澳，乃至於東協區域的整合，並誘使台灣加入。在政治上，藉由「拉藍打綠」、「分化淡綠與深綠」等策略製造台灣內部分歧，一方面，積極籠絡登陸的台灣人，包括台商與台生，另一方面，與泛藍建立了政黨交流平台，並透過泛藍在立法院的優勢，監督和制約台灣的執政當局，而進一步壓縮台獨發展的空間。中國一方面籠罩，另一方面吸納，一方面強硬，另一方面柔軟，在兩極間的移動過程，已逐步將台灣套入其體系，而讓美中台的三角關係益

加往中國傾斜，尤其是在中國的拉力與國民黨政府的推力下，又更進一步地向中國整編，而兩岸以北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乃日趨完備。

本論文旨在揭露，在抗擱中國長達八年的柔性併吞之後，馬英九的戰略與政策的轉變，使得台灣在結構與內容上更往以中國為中心的運動方向前進。陳水扁政府時期，台灣固遭孤立化與邊陲化的壓力，但終究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滑近中國軌道的態勢，但馬英九 2008 年 5 月上台後，清除了陳水扁所設立的障礙而採取與中國全面性的交往政策，雖使得兩岸表面的衝突態勢趨緩，卻使得台灣更進一步地編入中國體系與運行軌道，而另一波的結構性摩擦與衝突實際上已在醞釀之中而躍躍然動。本文試圖從馬英九政府的戰略轉變與其在主權議題、外交作為、國防政策、以及擴大兩岸經貿交流等對中開放的政策改變，所產生的新態勢與可能的後果，指出其戰略與政策上的盲點與疏失，以及未來在兩岸統一與反統一的鬥爭過程中，所可能面對的困境與風險。

貳、從「聯美親日制中」到「尊美貶日親中¹」的戰略轉變

2008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的新政府正式上路。對照於陳水扁政府八年的執政，這是一個全新而截然不同的紀元。在兩岸政策上，馬英九總統與陳水扁前總統路線根本的不同仍在於背後統獨路線的終局選擇。陳水扁的兩岸政策立於「一邊一國，互不隸屬」，而馬英九固然標榜兩岸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不過其基礎的終局選擇是服膺於「終極統一」的選項。而二者的差異也反映在安全觀與主要的對外關係政策的不同選擇，尤其是在對美、日、中的戰略關係上的不同：

¹ 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揭露，馬政府是以「和中友日親美」為政策主軸。但本論文的詮釋卻不相同；參見陳林幸虹（2009）。

一、尊美：以友善與美國互動

陳水扁時期強調以聯合美日的民主與安全同盟約制專制的中國之策略，馬政府上台後在增進台灣與美日的關係上並無氣象一新的進展，與日本的關係則嚴重倒退。馬英九聲稱要修補陳水扁時期台美互信的傷害，實則只是間接與附帶的意義，其首要與直接要修補的看來還是兩岸關係。2008年8月馬英九過境美國，異常低調，他對媒體說：「人家怎麼安排，我們就怎麼做。」，並未要求過境美國東岸，也未要求與過境不相符的活動。對於一個新上台的政府，恐怕也意味美國並未全力支持馬政府的一種表態。馬的說法是希望能修補與美國的關係，建立互信，所以自我節制。這固可往善解人意的體貼去理解，但對於一個台美的「新婚關係」，也未免淡得有點特殊。如果我們權謀一點來臆測，這究竟是美方的冷淡，還是馬刻意保持與美國的距離，以讓中國放心的舉措，不無疑問。2008年9月29日國防部長陳肇敏宣稱台灣的軍購項目明確包括 F-16 C/D，但美方卻仍遲遲不給。總體看，馬英九政府上台以來，美國除了在外交辭令行禮如儀地給予正面的肯定外，實看不出有何激勵新政府的政策出台。而立法院王金平院長訪美其間聽聞，美方推遲對台軍售，乃是因為擔憂馬政府過度親中，萬一未來高性能的武器經由台灣移轉予中國，恐成美國心腹之患。而事實上這種傳言，一直到了2009年9月9日林郁方立委率領「台美國會聯誼會」訪問華盛頓時仍存在：美方仍有人質疑中國對台灣交往政策其背後的意圖（無作者，2008a）。依此看來，美國對於馬英九兩岸政策路線的疑慮之深，不言可喻。2008年8月15日外交部次長夏立言（2008）曾表白，那年有關參與聯合國的提案改採爭取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是「回應美、日提出的建議與期待」。而今（2009）年4月22日第三次江陳會前，年馬總統要求美國軍售台灣 F16C/D，也適度對美國展示自我防衛決心以及忠誠盟友的表達，是要讓美國不要對他有一味向中傾斜的疑慮（王宗銘，2009）。

二、貶日：疏離日本討好中國

至於馬政府在對日方面，上台之初其態度是明確而沒有修飾的。聯合號海釣船事件本身相當複雜，但馬政府態度強硬、明確，不計一切，甚至不惜與日本一戰，並又祭起召回駐日代表許世楷的手段，在如此短的時間過程，這些操切顯示馬政府當時在所不惜的心理狀態。在外交上召回大使是嚴重的表態。2001年4月1日美中在海南島上空軍機擦撞的嚴重外交衝突，美中雙方尚且沒有如此作為，其交涉的時間甚至更長。況且，台日的民間關係一向良好。在扁政府執政時期，2006-2008 連續三年台灣智庫所做的民意調查皆顯示，日本是台灣受訪者視為對台灣最親善的國家，甚至比例領先第二名的美國甚多（台灣智庫，2006、2007、2008）。在這麼友好的民間關係基礎上，馬政府的驟然翻臉以及操切用力的作風，不僅在外交專業處理過程上是罕見的，同時也不符合日關係的現實。孰令致之？這除了可以解釋成馬政府對日本政府的重視遠不如扁政府之外，是否也是一種遷就中國，向中國示好的舉措，值得玩味。在「兩岸優於外交」的準則之下，馬政府處置釣魚台漁船事件被戲劇性地誇大，一覽無遺。當馬英九公然表示擔心兩岸交流進度趕不上民眾期待時，他另一方面則對日本採取過激作法，兩相對照，令人對於那種「親中而貶日」的政策印象深刻。而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台灣未定論」的發言，既使得台日關係受到斷傷，而日本民主黨選舉獲勝，試圖強化與深化日中關係的作法，拉抬日中關係，頓令台日關係變淡，一上一下，兩相比較之下，台日關係乃顯得更為脆弱。

三、親中：和解改善對中關係

自馬英九就任以來，所謂的活路外交、外交休兵以及大幅鬆綁與開放的兩岸政策，已使得中國的考量成為其對外政策核心中的核心。對照來看，馬政府在政治上向中國不斷退讓，在社會經濟上則加強與中國整合。2008年8月26日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陽報》訪問時，將兩岸定位是「非國

與國的特殊關係」。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的事後解釋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是「對等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關係」。馬政府的理想是兩岸即便無法做到「相互承認」，至少做到「互不否認」（無作者，2008b）。然而，北京並不鬆口，仍舊否定中華民國的法理地位。有趣的是，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公開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具主權獨立，不具資格參與聯合國活動時，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竟為之緩頰，說這是一種意外狀況。9月18日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審議台灣友邦連署的提案再度被拒。馬英九的回應是：「友邦認為我國今年的爭取方式比較務實，受到的阻礙也比較少，未來還會繼續努力。」，外交部雖說，不會視為善意解讀，但中國代表的發言與過去有所不同（陳洛薇、劉尚昀，2008）。足見馬政府極力建構與粉飾兩岸美好關係的用意，以及極盡軟調以期待中國方面有所改變。對於政治人物而言，這種「料敵從善」的特殊作為在歷史上仍是罕見的。而馬英九主動向中國伸出和解的誠意也表現在對待邦交國的關係方面。馬政府也已公開其不進行金錢外交的承諾，他甚至對於中國與我邦交國的接觸，樂觀其成。這種先讓步以換得對方相信的誠意，不僅在兩岸政治史上是特殊的，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是少見的。除此之外，為了獲得北京信任，吳敦義院長更願意犧牲民主原則，而對北京進行政治討好。他說「我支持中國大陸在民主化方面慢一點，否則會亂的。」這是深深瞭解中國環境，並懂得討好中國的政治語彙（曹長青，2009）。

由此看來，馬政府雖然尊美，但實質的政策更多是親中。其向親中路線傾斜已是事實而非臆測，而其親中的政策裡尚有邁向「統一」的使命成分，並且，其對中國的總體戰略哲學觀顯然在於：「讓」。而如果我們將馬英九的信念與政策措施，對照中國對台灣「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的戰略來看，無疑地，已可讓人清楚地看到，在馬政府的政策驅動下，台灣正加速往中國的胳臂內彎前進，而更進一步編入大中國的政經體系。馬政府這種「尊美貶日親中」放在2009年7月27日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以及歐巴馬11月15日至18日訪問中國過程，中國氣勢高漲的情境脈絡來看，顯

然是期望在有美國某種程度的保護的大膽之親中作為。此一戰略選擇更充實了中國建構中的納貢體系。

叁、馬政府與中國交往的謀略與盤算

一、擱置爭議與務實靈活

在九二基礎上擱置爭議，是中國接受馬英九最根本的地方。與中國交手，馬英九採取在主權上模糊以對，一方面爭取兩岸和平空間，一方面安撫台灣內部部分怯戰的情緒。而馬英九與胡錦濤找到的共識「擱置爭議」與「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實際上是一體之兩面。然而，這一模糊暗藏個盲點，也就是：不獨，是馬胡雙方的共識，「不統」卻不是。精確地講，「不統」的意思是：「不立即統一」，但不是拒統。「統一」是馬胡雙方對兩岸終局選擇的默契。2008年五二〇後，總統府與外交部網站立即將國名從「中華民國（台灣）」恢復成為正式國號「中華民國」，這種「去台灣化」的動作是一種政治手勢，為的應該是釋放誠意以爭取中方的信任與信心。馬政府與國民黨一再為所謂的「擱置爭議」背書。不過，仔細去分析，將會發現，「擱置爭議」與「擱置主權爭議」二者之間雖僅二字之差，但意義確有千里之距。從中國共產黨當下的利益來看，擱置爭議有利於暫時避開政治對立而加速兩岸的整合，它可以模糊與掩飾爭議背後不牢靠的對台統治基礎。中國主權的落實範圍本就不及於台灣，沒資格對台宣稱，這是現實，模糊可達混水摸魚的效果，自然是北京所樂見的。至於國民黨的盤算應該是：刻意不提「主權」的爭議，避免破局，而寄望在不堅持主權的立場下，得到北京在實質的議題或對外空間的讓步。這應該是馬英九與國民黨內心的算計。

一般藍營支持者多數相信，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民進黨敗選的部分理由，是因為民進黨過於執著於主權與認同議題，而在經濟議題上的表現

無法令人民滿意。他們也普遍認為台灣需要一個務實的團隊與政策來帶領台灣自經濟的泥淖中走出來，而馬英九不強調主權與台灣認同問題的務實路線，將是帶領台灣走向希望的最佳選擇。但一個台灣無法規避的現實是，有關主權的爭議問題，中國是聯合國所認可的主權國家，不存在爭議，台灣仍無身份與席次，其地位是有爭議的；擱置爭議的結果只是逼台灣單方面壓抑自己爭主權的權利。從維護台灣主權地位獨立的角度來看，模糊策略不僅會延宕台灣法理主權的獲取，甚至既有的實存主權也將難以為繼。藍營支持者與馬英九的團隊一再強調「擱置爭議」的靈活性，並誇稱其「去意識型態化」的務實風格。然而仔細去探索，我們將發現，在現實上馬英九與藍營人物所謂的「去意識型態化」，不過是由「去台灣化」走向「中國化」，反對「台灣化」支持「中國化」，其實是走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窠臼。所不同的是，對於生於台灣這塊地上的人而言，「台灣化」是內在的、是生活的，「中國化」則有很大部份需通過更多的學習，才能獲得；中國化有很大程度的不真實性。

二、活路模式與外交休兵

外交休兵源於馬英九總統所提的「活路模式」與「暫行架構」(*modus vivendi*)，而後二者是一體的兩面。英國的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引用此一名詞表達一個國際政治的概念：爭議的雙方為打破政治僵局，提出的一種暫時的變通政治框架，以填補正式政治條約達成之前的交流空白。然即使雙方達成了此一暫行架構，亦並不意味雙方要承認對方的立場和價值觀，基本上，它為的是建立一個求同存異(*agree to disagree*)的管道。根據馬英九總統自己的說法，其外交休兵是強調和解，不和中國在邦交國數上作惡性競爭。兩岸政策是台灣外交的上位政策，台灣的外交空間是透過與中國協商出來的。他希望透過外交休兵，低調行事，避免與中國出現衝撞或爭論，清除中國對台灣所進行超出其「主權禁忌」之外的生存空間的打壓，以期待台灣在實質議題上回到世界應有的分工位置。

理論上，外交休兵是一個值得鼓勵的方向，實際上，台灣除了在傳統安全的範疇外，在有關非傳統安全上有一定的角色與份量，包括人類安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經貿科技、醫療衛生、反恐反毒、防制洗錢、打擊犯罪、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等。然而，問題是，即便非傳統這類活動也無法免於中國的打壓與困擾。中國外交打壓事例包括在「聯合號」等事件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阻絕台灣與美國官方接觸正常化，打壓「捷克民俗協會」台灣學童海外表演等等事例，層出不窮²。北京的打壓並不是以此「傳統」與「非傳統」來分類，而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與權力來衡量。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北京近幾年來高唱和平發展，在國際上已取得一定的進展。其外交休兵的意義在於：一、維持國際上和平形象；二、收攬台灣人心，壓制台獨勢力；三、以便專心處理內部事務。對於北京而言，國民黨收復台灣總勝於民進黨執政。只要「反獨」得以牢牢固住，促統可以慢慢來。沒有台灣的烽火外交的刺激，北京可以專心於其長遠的政策佈局。因此，單從可獲致的實質內涵而言，北京確實可在馬政府所釋放的活路模式或外交休兵獲取其所欲得的實質利益。同樣地，馬英九政府也有所獲，但卻是邊緣的利益。中國在邊緣利益方面放得開，但核心的法理主權卻滴水不漏，寸步不讓。2009年9月17日聯合國第63屆常會，馬英九政府參加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提議依舊被拒絕了。這和2008年連戰得以順利被接受成為台灣參加APEC領袖會議以及2009年5月葉金川署長得以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會議相對照，答案已很明顯，北京政府是在突出：台灣參與國際空間有條不可跨越的主權界線，而凡在界線之內只要願意祈求北京的加持，北京是不會吝嗇的。

² 2008年7月3-6日，台北市永樂國小歌仔戲團應「捷克民俗協會」之邀至捷克參加藝術節演出，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干預，永樂國小無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舞台上展示中共五星旗，案經永樂國小向該協會抗議，表示如不取下中共國旗，該校歌仔戲團將拒絕演出，後經協商改以永樂國小校旗取代。

三、防衛固守的守勢國防

概略地說，馬總統想建構的新國防戰略觀是一種守勢國防，其重點在於建立固若磐石的軍隊，不主動發動戰爭，但維持一定的軍事嚇阻力量。在某個意義上，馬英九與陳水扁的國防戰略，差異不大。不過，因為其所立足的基礎不同，其現實的差距也就不可謂不大。馬的基礎是建立在終極統一與其對中國較和平與樂觀發展的期待之上，如他所說的：

中共經過三十年後，提出開放改革路線，政治上，操作群眾運動遂行政治鬥爭的景況已不復存在；而改革開放也為大陸帶來巨大的經濟成長，大陸外匯存底全球最高，為一兆九千億美元。在這些情況下，兩岸關係的本質自然發生了結構性改變。

因此，他認為，我們必須要用新的思維來重新評估兩岸間所應該採取的策略。當然，他也指出，身為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他要將機會變得更大，威脅變得更小，而國軍的責任則在協助總統應付國家面對的威脅。只是，有這麼容易嗎？從謀略的觀點看，其所架構的守勢國防也許反而更可能帶來威脅的極大化。

為了使任何想要侵犯台灣之敵人不敢輕舉妄動，他主張，要建構「固若磐石」的國防戰力，使之成為維護台海和平的堅強後盾。在這裡可以看出，他很明確地從陳水扁的境外決戰的那條線退到高築牆的陣地防守，從過去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的主動防禦與境外反制，轉變為「刺蝟式」的守勢戰略。所以，軍方為他所謂的「固若磐石」提出了詮釋，即：「嚇不了」（戰志高昂）、「咬不住」（封鎖不住）、「吞不了」（佔領不了）、「打不碎」（能持久抗戰）。馬政府主張所謂的「刺蝟戰略」，此乃是強調「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而究竟主動防禦與被動防禦何者為優，這往往是實作的範疇，非靠理論演繹或經驗歸納所能全稱論斷。然而，倘若我們以馬英九現實的政策需求去返照其戰略理論，我們便可發現他那套戰略理論早已瀕臨土崩瓦解的命運。道理在於，近來馬政府遊說美國賣 F-16 給台灣，而其中 F-16

C/D 一向被視為既是防守性，也是攻擊性武器，而中國偏向將它視為攻擊性武器。屆時一旦購買得成，馬英九政府的軍事戰略將向民進黨傾斜，其戰略理論將被迫調整，畢竟，武器會帶動戰略的調整，或換個角度說，實際上戰略理想已經不起考驗，而 F-16 C/D 的武器的購買是現實需要。果其然，則國共的軍事關係也將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極諷刺的是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泛藍立委在立法院杯葛民進黨政府對美軍購達六十幾次之多，但馬英九執政後，卻明確地告訴美方，台灣對美軍購案的決心，期盼美方儘快順利通過，並警告美國如不履行要求，在國際間將有背信之嫌（無作者，2008a）。

四、擴大兩岸經貿交流

兩岸經貿的開展是馬政府選舉期間最核心的競選承諾。2008年7月4日的開放兩岸包機直航與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是馬總統上任不到兩個月的兩岸政策大戲。不過，包機直航的首航當天股市大跌165點，顯示包機直航的開啓並沒有如預期般地激勵市場士氣，反而重挫。馬政府最為輿論所詬病的是，在未深入評估與沙盤推演前，就公然單方宣布首航日期，這種躁進與大膽承諾確定日期的作法，反而使其自身缺乏一個政策的迴旋空間，而陷入被動與不利的情境。當時台灣民眾與業者，甚至中國觀光客，抱怨者不在少數。事實上，早在4月22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便承認在作業線上人力不足的窘境，由此可見開放的急促與粗糙。開放政策本身受肯定，但不當的行政疏失卻帶來更多的損失與成本。同時，全面與躁進而非漸進的開放實已將台灣置於充斥著風險的環境。

馬英九總統上任以來，最自豪的政績是開展以經濟為優先的兩岸關係，並且強調「先經後政」。2009年五月初他提出了讓台灣重回大中華經濟圈懷抱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以作為兩岸經貿談判時我方的提議。ECFA是馬英九競選期間所謂兩岸『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的正名，此外，他更提出所謂「識正書簡」的兩岸政策，有意向中華文化圈靠攏的意味。11 月 16 日兩岸簽署了金融監理合作了解備忘錄 (MOU)，是第一項由兩岸官方代表簽署的文件，避開政治性頭銜，以換文方式完成，一般認為這是作為接下來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敲磚石」(葉素萍，2009；無作者，2009)。

就目前而言，台灣深藍與深綠的陣營在 ECFA 這個議題上，各說各話，沒有交集。然而如果從務實的淺綠觀點來看，截至 2009 年 9 月，中國外匯存底已達 2.27 兆美元，遙居世界第一，崛起的中國是必須理性面對的事實，從台灣發展的利益思之，一個和平穩定的台海關係是一般人所期盼與樂見的。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尋求台灣的最佳利益，在戰略上雖不易得，但不必然是全然不可能者。開放政策對台灣有積極的意義，但戰略規劃失誤或技術操作不當，都可能陷入開放的陷阱。中國廣大的市場提供台灣經濟一個重要的出路。但台灣對中國的貿易與投資嚴重失衡，依賴日深；經濟的依賴卻造成政治的依賴與安全的困境。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安全乃屬不同範疇。而不同範疇間正反面的相依相成，反而是成就謀略所不可或缺者。國民黨執政後，為了向北京表態，急切與民進黨政府切割，未能有計畫、有步驟地利用民進黨在兩岸上為台灣所掙出的談判空間與籌碼，不僅造成整體國家資源的浪費，也因經濟、政治與安全，三路同步齊發的開放，導致人民對政府過度向中傾斜憂慮的加深。令人擔憂的是：中方佈局嚴整，攻防條理，台方卻凌亂失序；北京「抓大放小」而台北「抓小放大」。馬英九總統治理能力聲望的重挫，固然受累於莫拉克風災，但就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開放層面過廣與開放速度過快，以及相伴隨之資訊公開不足、公共辯論不透、民眾認識不夠等現象皆成為台灣民眾在與中國接觸時普遍缺乏信心的主要理由。

相反地，北京在兩岸復談上不僅有擁有主場優勢，而且因為團隊與策略規劃完整，將更見信心。中國沒有政黨政權移轉的問題，同時政策與人事高度延續性，上從胡錦濤，下到海協會的成員，一條鞭的談判隊伍，既

有涉台又有涉外要員，上下與裡外，佈局分明有方。台灣則是徹底更換一套戰略原則與隊伍，而且內部缺乏紀律，未戰先亂，自陷於內部紛擾，此一現象從國民黨大老的爭相競逐造訪中國以及參與談判成員，藉媒體曝光而爭知名度者，看出一斑。而國民黨對共產黨百般求全，卻吝於對綠營政黨進行遊說，導致台灣內部相互掣肘。兩岸談判的態勢，早已高下立判。

肆、馬政府的戰略盲點與嚴酷挑戰

總體考察馬英九總統的兩岸政策，可以說，「終極統一」是其政治觀的根本基礎。對於一個民主政治而言，其政策主張的路線本無可厚非，但其戰略佈局已出現逐步將台灣鎖入中國系統的盲點，這對於當下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已產生嚴重的衝擊，也將給馬政府帶來嚴峻的挑戰。茲分別就主權、外交、經濟與政治幾個層面的發展，分述如下：

一、主權的自我弱化

回看陳水扁過往的八年外交政績，固然風波迭起，而評價不一。但總體而言，其對於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努力，既超越李登輝，也為馬英九留下與胡錦濤交往的迴旋空間。李登輝在其任內曾用盡心思處理兩岸關係，但未見中國共產黨對於「中華民國」有較正面的看法，一直到陳水扁執政後，北京仍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但在很多場合北京擔心中華民國遭民進黨遺棄，而變相形成保護中華民國的言論與舉措，至今猶為決策圈茶餘飯後的笑談。而陳水扁為馬英九累積的籌碼豐厚，但可惜馬英九急於與扁切割，為了討好胡錦濤，而急於一次出清。民進黨累積八年的籌碼被馬英九一夕給全數賤賣，只贏得中方一個口頭嘉獎，但中方對台灣的國際打壓仍不手軟。

馬團隊對內壓抑上漲中的「台灣意識」，而堅持「中華民國」與「一中各表」的同時，其面對北京卻處處示弱，欲委曲以求全。馬英九主張以

彈性務實的態度加入國際組織，因此出現馬英九片面放棄主體性的宣稱、時任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訪問中國不敢稱呼馬英九「總統」而稱「先生」種種過於柔軟的姿態。馬英九團隊內外有別的表现是：一方面極盡「去台灣化」之能，另方面對中國百般忍氣吞聲，柔軟地適應北京的需求。這些作風的特色似乎可以這樣解讀：既然有中國的富強願景，對台灣的認同可以不必放大；主權在經濟生活上並不是很重要，所以未來不必跟中國爭台灣的主權地位；能生存苟活最重要，活著就是希望。只是，面對一個有五千年政治鬥爭經驗的悠久帝國，馬將兩岸安置在外交的優先之上，並充分展現忍讓作風，而缺乏轉轍或回頭的雄厚本錢時，無疑地他已將台灣一步步地推進大中國的策略環節，而讓台灣陷入逐漸喪失政治獨立，萬劫不復之境。尤其是，隨著兩岸經濟交流更進一步開展，所謂「Chiawan」大市場概念的出現，更放大了大中國的概念。而當經濟的大門打開之際，政治、社會、文化與安全卻也百花齊放，爭相交往，當仁不讓，馬政府在擘畫與中國大交往的美麗願景之同時，實已將台灣曝露於中國的戰略陷阱之中。尤其是，在與中國缺乏清楚界限、過密的交往將使台灣宛如掉入大醬缸，終將被淹沒於與中國官方暨民間綿密的交流巨浪之下，而難逃濃烈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激情的煎熬。胡六點的講話中特別強調當前的兩岸關係的本質是：中國內戰遺留而延續的政治對立，但不是領土或主權的分裂。未來馬政府要面對的兩難是：一方面，馬政府不敢去挑戰北京的主權論述，換取一時的和平，但卻讓台灣處於被動地位，空間越來越小；另一方面，馬政府無能弭平內部統獨與族群矛盾，裂縫存在著，卻要與北京全面交往與政治接觸，統獨對立乃更為加劇。當國民黨努力試圖在主權上對北京妥協以換取北京更多的信任時，藍綠的和解更是遙遙無期，並且也將使台灣在民主與人權議題的優勢，更無從發揮。

二、外交的附庸化

2008年九三軍人節前夕的慶祝大會上，馬英九總統公開承認，他尚未

與中國方面討論有關活路模式與活路外交事宜，他也很自信地認為，國際社會對其政策已有正面回應，而中國也已清楚地收到此一訊息，因為談判還未正式展開，因此他辯稱，並未犧牲主權，也未向中國投降。然不可否認的是，自其上台以來，不僅巴拉圭，多明尼加、瓜地馬拉、海地、巴拿馬也紛紛表態不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案。這些國家與台灣之間外交關係的基礎，既賴物質利益，也需道義。但問題是，馬已幫他們解除道義的枷鎖。對照於中國未對開放我和其邦交國家的接觸，馬的片面自廢武功，將使台灣未得其利，便已先受其害。馬英九推動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策略與春秋時代宋襄公的堅守仁義以致於吃敗仗的風格，正好今古呼應。

相對於陳水扁時代的外交政策的著眼點是立足於「一邊一國」而進行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的突圍與拓展，馬英九是在統一前提下，追求以不在名份上計較，而以台灣之小來事中國之大。馬英九所期待的兩岸和解休兵以及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的協助與彼此尊重，實可放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不過，橫梗於馬英九面前的挑戰是：在馬英九與胡錦濤的對奕過程，不管就其所能援引的資源與實力，或國家或政黨內部權力一統的程度，相對於胡，馬遠遠不如。現實而言，馬採取主動交往政策能否搶到主導權，不無疑問。問題是，馬不斷拋出議題，在態勢上是採取主動。而向強勢所設定的戰略框架主動挺進，但卻在實力與環境條件居處弱勢的一方，其所面對的策略風險不可謂不大。更何況，其採取親中政策，如果中國因為各種理由而無法相應於馬的需求時，馬將陷入進退維谷、騎虎難下的情境。就目前為止，馬總統的親中政策已傾囊而出，甚至不惜以不在主權上力爭以及「去台灣化」示好，但台灣所得者仍只是技術與枝節庶務事項，付出與獲得之間，嚴重懸殊，不成比例。

中國方面對於主權問題十分堅定。中國駐聯合國常代王光亞的發言透顯出中國未來處置台灣國際空間的準則輪廓。他主張，北京對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變，聯大 2758 號決議已經解決中國在聯合國及所屬專門機構的代表權問題；而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5 年達成的「諒解

備忘錄」已提供台灣參與會議活動的便利（王良芬，2008）。未來，中國有可能再將此政治烏籠適度放大，並交換台灣某種的政治回饋。至於馬英九也有不得不接受的難處，畢竟破局對於馬英九的傷害遠比胡錦濤大。接下來，馬英九要面對的不僅是綠營對他過於遷就中國的不諒解，他同時也要承擔一旦向綠營路線靠攏而導致國共再度決裂的風險。

三、經濟鎖入中國

馬政府的支持 ECFA 的官方立場，表現在經濟部次長林聖忠與陸委會副主委高長的辯護（馮復華，2009）。經濟部次長林聖忠表示，以擴充外需來增加經濟成長，是台灣等小型開放經濟體所需採用之策略。也就是要藉由中國這個外需市場與台灣內需市場的聯繫，以擴大台灣的經濟版圖。然而，在缺乏國際市場的積極奧援之下，此舉無異於是台灣這個外需市場編入中國內需市場的一個過程。從現實來看，台灣在市場擴張上需要中國者，遠勝於中國之於台灣。林聖忠辯稱，除 ECFA 外，政府也從未放棄與他國多邊簽署自由 FTA，且 ECFA 可透過商品勞務自由化來慢慢洽談，對台灣有利的產品要求提前開放，減少東協加一的衝擊。但台灣與他國簽署 FTA 都受制於中國的反對，於是構成了一個形態：中國一方面大開台資流入中國的渠道，一方面阻擋台資更便利流入其他國家的可行性。未來當兩岸產業規格與市場制度透過協商而更進一步接軌後，台灣開拓與其他國家經貿的力度將遠低於台灣對其他國家。由此角度，當陸委會副主委高長主力，「各界不要一味反對 ECFA，應該從『要不要簽』轉向『如何簽』的辯論，謀求共識，形成對台灣最有利的方案」的說法，可以說完全不瞭解綠營憂慮的一種說詞，而有將戰略化約成戰術之嫌（陳秀蘭，2009）。

當然，台商與政府的角度會有差異。對於有競爭力的台商而言，如也能打開東協或其他國家的市場，市場更多，但退而求其次，打開中國也有助益。而當中國與東協建構自由貿易市場後，中國成為台灣進入其他國家的轉運站。可以想見，不管以中國為最終市場或以中國為中繼市場，台灣

對中國趨之若鶩之勢，都將因為 ECFA 的搭建而更為成型。實際上 2008 年台灣對中國投資佔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已超過七成，顯示台灣的「全球化」策略幾已等同於「中國化」。就此而言，綠營的觀點是有一定意義的。而察考港中簽署 CEPA 後，對於中國強調的大規模生產，如魚得水。但它卻未給香港帶來經濟幸福，對於管理、專業與服務品質的提升，幫助不大。全球化的邏輯，使企業四處外包，導致香港自身低階服務勞力面臨空洞化；剩餘的低階或半低階勞力也不及訓練。雖然也有出現一定的榮景，但卻只是少部分人獲利，失業問題沒改善、中小企業的困難依舊，香港本地企業面臨中國內地供應商成本價格的競爭，又面臨外商高品質的競爭，進退兩難。CEPA 理想上可增加香港去中國投資的機會，但專業資格相互認證與人才交流也碰到中國內部的保護主義、不透明的潛規則與人際網絡的限制。港資要深入中國，壯志難酬；相反地，中國因素一旦進入透明與法治的香港，將如入無人之境。

香港的經驗堪供台灣參考。兩岸簽署 ECFA 被質疑的問題將是：誰獲利？兩岸之間，又是誰獲利最多？此外，台灣以小事大固是應有智慧，但一股腦鑽入中國的戰略框架，台灣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恐會被犧牲，將無幸福可言。滿清入關統治中國，終被消融。為追求台灣的獨立性，適度的隔絕是必要的。

前經建會主委、台大經濟系教授胡勝正指出，簽訂 ECFA 短多長空，將讓台灣經濟更加倚賴中國（于國欽，2009）。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則認為，簽訂 ECFA 後將使台灣成為中國的鄉下，除老人和土地外全數資源外移；他主張台灣應著眼於加強技術研發能力，維持技術優勢，拉大與中國產品差異程度，擺脫對中依賴（林向愷，2009）。而前經建會主委、台灣智庫董事長的陳博志主張如果「兩岸 ECFA 洽簽，如果但書中增列大陸不阻撓台美、台日 FTA 洽訂，並願意 ECFA 在台美、台日完成 FTA 簽訂後再同時生效，他可以條件地支持（陳秀蘭，2009）。只是，這種要求不可能為北京所接受，北京要建立的是以它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不可能接

受台灣與其它國家自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除非台灣接受一中原則，同時，順序必須在 ECFA 之後，且是兩岸共同協商出來的結果。

2008 年 12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2008）在對全體台灣同胞的講話中，列出大陸未來對於台灣工作的六大重要方項，其中一項胡錦濤已清楚表明：

兩岸可以為此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以最大限度實現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建立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進程，有利於台灣經濟提升競爭力和擴大發展空間，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有利於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

北京不可能接受的另一理由是：目前台灣經濟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台灣的態勢越來越明顯，並且，國民黨政府也不斷強化這種主觀的預期心理並在制度的建構上越來越捲入依賴中國的方向前進。

ECFA 將給予台灣進入中國的資本享有更自由空間，這是一得，但台灣得以准入中國的公司的給予，終究操在中國政府手中。屆時，民族主義與族群的因素將介入台灣的經濟體系。中國政府會否以統獨意識或民主意識「正不正確」來操縱，對台商進行政治檢查？值得憂慮。香港的經驗是，CEPA 的任意性與自由裁量，為特權與貪污開一扇門，香港政府曾因此挨批。同時，香港過度連結中國也傷害了香港的開放性，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互惠，也將使台灣支付其它國家對中國產品與香港服務業的禁制所導致的池魚之殃。CEPA 影響了外國在香港的利益並鼓勵了裙帶主義風氣。可以預期，開放中資來台後，在台的中資加上他們可以影響的企業，將自動形成中國利益代言的龐大「親中集團」，主導企業生態。此外，資本流動背後存在政府的干預，亦是隱憂。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未來中國政府得以藉對於中介公司的指定介入兩岸漁事（黃淑莉，2009）。中國公布的『陸資入台通知』更規定入台中資不得違反統一和國家安全，還規定要嚴格監督企業是否違反規定。中國本欲插手台灣事務，而制度化的機制都將提供中國官方展現意志與介入兩岸事務的一個平台。而就官方

對官方，分裂的台灣實難以對抗內部高度一致的中國。當兩岸金融流動特殊化之後，在兩岸相互交往的架構下，中國政治因素入台將更加便利。如同 CEPA 將對於「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自主地位產生了特洛伊的木馬效應（Bowring, 2003），兩岸簽署了框架協議後，也恐將步香港之後塵。基於國家安全而對於有威脅資本的監控與管制，即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自由經濟體，都會設有安全閥，更何況渺小的台灣。在 2005 年 8 月中國的中海油（CNOOC）欲高價併購美國優尼科石油（Unocal），結果立即受到美國國會的阻止，並通過決議不讓中海油去併購優尼科。2007 年美國便提出過叫做 Exon-Florio 的修正案，它明訂凡具有政府背景而欲進入美國股市或購買美國安全相關的產業，都需經過對外投資委員會的審查。

顯然，國家安全的憂慮並非只有台灣，美國也很重視。人民趨利如水走下，中國市場有其便利性，乃是事實。但就政府的角度而言，作為管理眾人之事的公權力，當它面對台灣資本大量向中國移動時，並且要冒經濟與政治風險時，政府實應做一個平衡器，往中國以外的市場去鼓舞與引導，才不至於過度向中國傾斜，逐步沒入其體系而滅頂。只是，與此邏輯相反，當前國民黨政府不只未有分散策略，反而是加速台灣向中傾斜的態勢。由較寬的視野看來，在國民黨的帶領下，當台灣越來越身陷中國所劃定的框框與窠臼下時，馬政府所面對的挑戰乃更加嚴酷。

四、政治融入中國

政黨政治的政策移轉乃天經地義，但過於蒼促逆轉，將導致前任政府所累積之資源的過度棄置，而造成國家總體資源的嚴重浪費，同時，也會加大內部意識型態與國家認同更嚴重的撕裂。對於一個原本已內部嚴重分裂而外部又存在壓力巨大的政治體質而言，過快的政策轉變會造成更嚴重的內傷。以台灣內部政治嚴重對立的生態而言，馬政府採行駕馭的策略會比適應的策略更容易增加摩擦與互不信任。協商或談判前在相關於主權議題上的過多讓步，即便只是口頭上的讓步，也將使台灣自身的談判籌碼更

形短缺。馬政府對於中國越讓步，台灣內部意識型態與國家認同的鴻溝乃越加擴大，馬政府能得到的民意支持將更混亂與不定。內部的失和與紛亂更難以歇止。主權爭議被擱置，對中國是一種中場休息，對台灣則是一種放棄。其得失的意義不同。而馬政府欲終止爭議的意圖，反而帶來了更多爭議的結果。主權放一邊了，爭議卻無終止。而馬政府避開原則尋求技術突破的作法一旦為中國所慷慨接受，甚至擴大開展，那麼，主權擱置配以擴大門戶開放的政策在目前兩岸格局與實力懸殊的狀態，將迫使馬政府如過河卒子般地向前提進，台灣將被逐步納入政治鳥籠。這表面上看來固可開展大開大闔的氣象，但卻缺乏一旦出現風險時妥善的退場機制的安排，而使得台灣人民所能感受到的潛在風險遠比表面與立即的利潤多得更多。

兩岸政經生態差異甚大，台灣處於被動與勢弱的大環境。在中國，「經濟為政治服務」，在台灣，則是「政治為經濟服務」。歷史上，兩岸關係的本質本是糾葛不清、複雜而漫長，我們宜從遠距來思考兩岸的發展。兩岸既然還有一段很長遠與迂迴的路要走。那麼，在夜路漫漫的進程中，馬政府在兩岸或外交議題上實不必操之過急。再從人民付託的觀點來看，在獲得來自中國的實惠之前，馬政府實應放慢對於中國讓步的速度，尤其在「名實」之間，不宜低估與輕賤「名」對於實質利得所可能導致對於台灣利益的傷害與損失。

特別是這一歷經文革的領導班，文鬥武鬥皆通，特別有耐心，且行事風格總是小心翼翼地。據報導，胡錦濤曾不許政府高層公開辯論台灣政策，而智庫學者對於兩岸關係亦有步步為營的呼籲出現。現在中國綜合國力又大幅提高，充滿自信。更何況，台灣配合演出者有如過江之鯽，共產黨高層自是不需張牙舞爪，可以氣定神閒以對。截至目前為止，在總體上，北京的統戰算是成功了。當連戰、吳伯雄、宋楚瑜三位重量級的台灣泛藍政治領袖以及企業大亨與社會名流，都大陣仗地遊走於兩岸之間。2009年12月26日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期間，馬總統因阻止藍營大老宴請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引起大老們的反彈。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回應表示

「江陳會舉行前，政府曾與連、宋兩人溝通，希望不要以主人身分邀宴陳雲林，這個做法是以大局為重，考量因素包括維安與社會觀感」。對於這種現象，前副總統呂秀蓮認為：

陳雲林來台，已經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國民黨不管「馬立強」也好，或整個國民黨高層與馬總統之間的關係，都起非常嚴重的政治變化，中國不但可以滲透台灣社會，還可以影響國民黨整個團隊。

令人不敢樂觀的是，兩岸統一的暗示已不斷在輿論、法律與心理等範疇推展開來，而台灣強固的主體性也將面臨被摧殘而走向枯萎的命運（彭顯鈞、李欣芳，2009）。

從戰略的觀點看，中國希望原則上堅持、在規則上鞏固，並進一步開大口，加大雙方交往，而利誘台灣深入，最終達成其完全統一的政治目標。目前，中國並不急於吃掉台灣，而是先把台灣黏住、套住，再慢慢消化。就像所謂的「誘、養、套、殺」之說。在推動這一套戰略的過程，中國也一邊在觀察台灣安全的守護神——美國——的動向。中國總書記胡錦濤在2009年5月的國共會談即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干涉。同時，在尚未統一的特殊狀況下，展開政治關係以及軍事交流和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探討。」這裡面外國勢力主要是針對美國。美國總統2009年9月訪中曾在記者會強調台灣關係法。而在台理事會主席薄瑞光隨後25日訪台提到美國對台軍售只是時間的問題，且未排除售予台灣F-16為評估項目之一的可能性。在中美關係更上層樓之際，美國不顧中方的強烈抗議，美國對台灣防衛能力的關切可想而知。目前美國方面的評估是，台美間的戰略觀有重歸一致的趨向，這種重歸一致是基於台灣的領導階層願意向北京重申無意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利益，同時，台灣願意與中國修好，並不是投降。然而，美國也會擔心，一旦兩岸從經貿融合進入政治性整合階段，台美軍售與軍事合作關係在新形勢中，恐將面臨調整（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大陸情勢雙週報，2009）。

從目前兩岸極不均等的態勢看來，在與中國這一巨人較量的過程，周密與耐心的思考與佈局以及獲致內部較圓滿的妥協之戰略與戰術，是很需要的。內部的和解與共識的凝聚是台灣與中國應對的關鍵。然而，以目前馬政府樂於且急於與中國大交道並建立協商管道，甚至以此作為施政主軸，但卻與在野黨任何無溝通的狀態看來，馬英九忽視了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台灣依舊是一個「分裂社會」，分裂的兩端，彼此間仍有高度的不信任感，但主政者不僅未努力化解，甚至一年來，從「一國兩區」說、達賴來台事件、熱比婭事件、到 CECA 的匆促推出、江陳會的維安衝突，都產生內部重大爭議，最後都加深了「分裂社會」的對立與不信任。而其間功過雖各有其詞，但讓中國輕易獲取漁翁之利，卻是不爭的事實。

未來國共雙方彼此的主觀期待，以及協商的客觀活動的增加，勢將使得「兩岸議題」更為熱絡。而在高雄市及民進黨因處理達賴與熱比婭與北京進一步交惡後，綠紅雙方的模糊與想像空間恐暫時蕩然無存。民進黨將被迫選擇與國共對抗的路線，並企圖凸顯北京對台的戰略意圖以及馬政府出賣台灣的作為。而國共應會相互「做多」，讓兩岸更進一步交往，以進一步邊緣化民進黨的位置與角色。加上未來五都與總統選舉的催化，台灣內部藍綠的對立，將會更形加大。此一問題是台灣未來與中國交往最需面對的內部問題。這個問題一旦沒有獲得適當處理，台灣很難擺脫被分化的惡性循環。在與中國對奕過程，內部萬眾齊心的台灣還不一定有勝算的把握；但分裂與互軋的台灣終將自取滅亡，而難逃被中國零細化，進而併吞的命運。而依眼前藍綠的對峙看來，台灣自身的發展似乎已步上後者。馬英九政府所遭遇的挑戰相當嚴峻。

伍、結論

由上述諸節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印象：馬英九戰略與政策上的反獨親中作為，在過去一年半的執政過程，密切地配合了胡錦濤的反

獨促統的基調與規律，一方面阻絕了台灣朝向擴大獨立性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加速了台灣被編入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與運行軌道。誠然，兩岸的緊張關係有明顯的緩和，但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角色卻逐漸模糊，而逐步喪失其撐起美、中兩等邊的力道，反倒是更充實了中國建構納貢體系的確立。而「擱置爭議」並未達成中國對主權行為者一方—台灣—的認可，相反地，反而成爲一種對於中國正統論的支持與默認。這些現象也反映在中國高層訪台時，國民黨官員對於包括中華民國國旗出現於現場的不安。這種藉委屈以求全的作爲，以讓步換取信任的作法，導致外交、國防、經濟與政治上士氣上的不足以及人民付託上的疑慮。而在外交與國防的議題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國內民衆的擔心，還要面對傳統友邦的疑慮。而當兩岸在各個領域接觸日深之後，台灣將被淹沒在大中華的政治與文化的氛圍中，難以逃脫、喘息。

馬政府在政策的推動上，忽略對於台灣自身經驗現象的仔細評估，而急於完成選舉所承諾的概念，導致陷入「燈下找鑰匙」或「刻舟求劍」思維盲點與困境，並對於結果有一廂情願的期待。當台灣與中國處於嚴重的貿易失衡時，經貿自由化的簽訂將使兩岸經貿易正常化面對短時間強勢的政策扭轉的壓力，而在此態勢下，與中國進行「一攬子對一攬子」³的交易時，自然是處於劣勢。但馬總統卻執著於「兩岸不簽 ECFA，等東協加三成立後，台灣會被邊緣化」的單一劇情，其結果自然不免要接受北京的無謂的要脅，同時，也加入支撐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行列。主權上的「一中各表」、外交上的互不否認以及國防上所謂「固若磐石」的守勢國防，也同樣出現類似的思維盲點與困境。在缺乏周密的謀略盤算，接下來在配合兩岸教育市場的開放，以及富有政治與政策使命的中資的大舉來台，未來，台灣的國家風險將益形升高，台灣內部中國化的氛圍將越來越濃烈，

³ 大規模的或無區別的交易方案是也。「一攬子方案」的出現，是由於談判各方認爲面臨的多個問題如果逐一解決難以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使談判陷入僵局，只有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才能使各方感到都有予有取，爲各方所接受。

從而伴隨而至的「親中／反中」的拉鋸，將更為激烈，內部國家認同與族群矛盾的對立也會更趨惡化。在當前這種險惡的處境下，台灣務須擺開馬政府當前以中國為中心的政策概念而進行思維的重新歸零，並在台灣的現實基礎上，重新找尋應有的定位與對策，尤其是透過積極的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作為，極力擺脫中國化的陰影之吞噬，在兩岸的互動中，讓台灣反向引領中國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 于國欽。2009。〈台灣在大陸市占率，創新低〉《工商時報》11月1日 (<http://blog.udn.com/tpa285/3457228>) (2010/2/4)。
- 王良芬。2008。〈我參與聯合國陳述縮水為一對一〉《中國時報》9月19日 (http://www.shadowgov.tw/?p=news,detail,11731&target=yan&yan=3&page_no=142) (2010/2/4)。
- 王宗銘。2009。〈馬總統：盼購買 F16C/D，希望美國毫不猶豫提供〉《Now News 今日新聞》4月22日 (<http://www.nownews.com/2009/04/22/11490-2440645.htm>) (2010/2/4)。
- 台灣智庫。2006。〈國際事務論壇 6——「國內民眾對我國當前外交之看法」民調發表暨座談會〉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lan=tc&category_id=28&article_id=670&BlockSet=) (2010/2/4)。
- 台灣智庫。2007。〈國際事務論壇 14——「台灣入聯與對外關係」民調發佈暨座談會〉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lan=tc&category_id=28&article_id=781&BlockSet=) (2010/2/4)。
- 台灣智庫。2008。〈「入聯公投與對外關係」民調發布暨座談會〉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ttt/servlet/OpenBlock?Template=Article&lan=tc&category_id=28&article_id=847&BlockSet=) (2010/2/4)。
- 林向愷。2009。〈打破依賴中國迷思，追求經貿自主〉《玉山週報》26期，12月7日，頁20-21。
- 胡錦濤。2008。〈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月31日，(<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0/8610429.html>) (2010/2/4)。
- 夏立言。2008。〈新聞說明會紀要——本部夏政務次長立言報告〉 (http://search.mofa.gov.tw/hysearch/cgi/m_query.exe) (2010/2/4)。
-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大陸情勢雙週報。2009。〈特稿／美智庫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看法〉1557期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0873152) (2010/2/4)。
- 曹長青。2009。〈馬的吳敦義五解〉《自由時報電子報》9月21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sep/21/today-o6.htm>) (2010/2/4)。
- 陳秀蘭。2009。〈陳博志，有條件支持 ECFA〉《旺報》12月12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2143+112009121200427,00.html>) (2009/12/15)。
- 陳林幸虹。2009。〈蘇起：和中友日親美，維持台灣安全繁榮〉《中央廣播電台》12

- 月 24 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27758) (2010/2/4)。
- 陳洛薇、劉尙昀。2008。〈聯合國提案被封殺，馬：繼續努力〉《中國時報》9 月 19 日 (<http://www.pchomers.com/viewthread.php?tid=16242&rpid=184065&ordertype=0&page=1#pid184065>) (2010/2/4)。
- 彭顯鈞、李欣芳。2009。〈阻大老宴陳，馬「過意不去」〉《自由時報》12 月 26 日，A3 版。
- 無作者。2008a。〈林郁方：美方不應把凍結軍售責任推給馬英九〉《中國評論新聞網》7 月 29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0/6/5/100706530.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706530>) (2009/12/17)。
- 無作者。2008b。〈馬英九兩岸關係新定位，朝野震撼〉 (<http://www.youtube.com/watch?gl=TW&hl=zh-TW&v=yXgt3JmMWtA>) (2010/2/4)。
- 無作者。2009。〈臺媒：兩岸簽署金融 MOU 模式或成兩岸談判新活路〉《你好台灣網》11 月 19 日 (http://big5.am765.com/jm/jjgc/200911/t20091119_513881.htm) (2010/2/4)。
- 馮復華。2009。〈學者呼籲速辦公投〉《中時電子報》12 月 12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CMoney/News/News-Page-content/0,4993,11050706+122009121200396,00.html>) (2009/12/15)。
- 黃淑莉。2009。〈農產協議，蘇治芬：為中開後門〉《自由時報》12 月 23 日，A4 版。
- 葉素萍。2009。〈民進黨：金融 MOU 應交國會實質審查〉《中央社》11 月 17 日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091117/2400186.html>) (2010/2/4)。
- Bowring, Philip. 2003. "Hong Kong and China: Trade Pact Opens Door to Cronyism." *New York Times*, June 24 (http://www.nytimes.com/2003/06/24/opinion/24iht-edbow_ed3__2.html) (2010/2/4).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Ma Ying-jeou's China-centric Strategy

Jiann-Fa Ya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Ching Yun University, Jhongli,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key factors, have been framing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d been in the state of being economically relaxed but politically tense during 2000-2008.

Ever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 won the election in March of 2008, with his active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independence-oriented green camp has been isolated and marginalized and a China-centric system integra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emerges. Although cross-strait relations turn to relaxation, they are further incorporated into a China-centric orbit. Another potential wave of frictions and conflicts seem unavoida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pict Ma'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in cross-strait policy areas, including sovereignty, diplomatic truce, defense, economy, and so on and so forth. It points out the blind spots and flaws innate in Ma's China policy and strategy. It also tries to propose strategic alternatives for Taiwan to break through.

Keywords: Ma Ying-Jeou, One-China principle, peaceful development, *modus vivendi*, ECFA